

抗战时期的

洪认清 著

延安史学

KANGZHAN SHIQI DE
YAN'AN SHIXUE

安徽大学出版社

现在中国历史学，应当是
将中国历史学，应当是
止于现在，应当是
张皓然所教人的！
10月东

抗战时期的

洪认清 著

延安史

学

KANGZHAN SHIQI DE
YAN'AN SHIXUE

安徽大学出版社

现在正处在革命战争年代，
我们应当作艰苦的斗争，
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战时期的延安史学 / 洪认清著.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6. 12

ISBN 7-81110-229-3

I. 抗... II. 洪... III.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党史—研究—延安市—1937~1945 IV. D235.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5204 号

抗战时期的延安史学

洪认清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印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开本	850×1168 1/32
联系电话	编辑部 0551-5108458	印张	8.125
	发行部 0551-5107784	字数	176 千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版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责任编辑	徐建 朱丽琴	印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封面设计	孟献辉		

ISBN 7-81110-229-3/K · 102

定价 18.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吴怀祺

洪认清博士的《抗战时期的延安史学》一书出版,在当前史林中,我以为是一本很值得重视的著作。2002年,他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近代后卷)出版了,现他的这本书又梓行。两本书的内容、重点有所不同,但又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本书是着重研究抗战时期延安地区的史学的专书。延安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到新的发展时期;中国学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百年史学出现了新的局面,开创出新的天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是中国史学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地上有延安地区的史学、国统区的史学,以及沦陷区的史学,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则代表了近代史学的发展方向。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延安地区史学家努力工作,把自己的研究与民族解放斗争结合起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学成为观察民族命运、争取光明前途的理论武器。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们从中国实际出发,挖掘民族精神,显示史学独有光彩,这份成绩是无法以某些不足、缺点而轻易否定的。

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今世界产生的巨大影

响,是不争的事实。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说:

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的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共产主义国家中强大的思想力量,在整个亚洲也是十分强大的思想力量。马克思主义对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影响也同样很大。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甚至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分析抱有不同见解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交口称誉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他们产生的巨大影响,启发了他们的创造力……

虽然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但是,要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唯一理论,是很难办到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史学哲学;它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教条,更不应当将马克思主义当做教条来使用。从某些方面来看,马克思是最不教条、最灵活的作者。^①

读洪认清博士的著作后,我有不少感触,在此书出版之际,说一说,我以为很有必要。这里想着重谈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性与实践性的问题,以及历史教育问题。

——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成就。

在20世纪的史学近代化过程中,一百年的史学成就是有目共睹的。^②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产生了,很快

① 【英】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 history》,Mouton publishers 1978,中译本,第26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② 洪认清:《历史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的《总论》的三章及《分论》的第十一章;《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地出现一批有影响的中国古史、中国近代史、社会史、民族史、思想史的大著作。无论在史料运用上,在对历史的解喻上,对历史前途认识上,还是在对当代社会的观察上,这些著作都体现出鲜明的特色。

洪认清的这本书,展示了延安史家的成就。范文澜、艾思奇、何干之和叶蠖生等,以及后来来延安的吕振羽等史家在历史研究、在史学理论探索上,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1938年5月5日,中共中央马列学院成立,这一年8月1日设立了历史研究室。史家编写了中国通史简编、中国文学史、苏维埃运动史、中级中国史读本等。

有必要指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延安地区的历史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强调研究中国历史特点,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在实际上也是为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历史学建设,做出了示范。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从中得到以启迪。

1938年,毛泽东同志说: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加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

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

延安地区的学风的重要方面是提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要研究本国的历史和现状。延安地区的史家研究中国历史，并不是按照外国的模式来套裁中国的民族历史。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谈到中国历史的过程和特点，按时下流行的话来说，没有机械地套用西方历史的“范式”；不是按欧洲西方的历史来剪裁中国历史，他说：“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大约四千年之久。”^②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割断历史的主观主义态度作了批评，这就是，“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③他把研究理论、历史与现状作为改变学风的三个方面提出来。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个重大特点，是其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唯物史观使中国人认清历史前途，成为进行革命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又集中体现为唯物史观对中国近代当代社会进程产生的重大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鲜明的实践性与科学性是辩证的统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一开始就显示出自己的特点。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者，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与对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2页。

^③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8页。

中国历史和近代社会研究结合起来。郭沫若研究中国古史是和观察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延安地区的史学特点也在此。

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与旧时的学派明显不同,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看成一种学派,而应看做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组成部分。这种新史学在当时民族解放事业中产生,又对民族解放事业产生重大的作用。

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与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史学的变动、发展。一百年以来、特别是建国五十年来史学发生的变动,经历的波动,归结到最后,都与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密切相关。即使是一个时期政治运动变动反映到史学上,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与对唯物史观的认识、诠释有关。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正确地而不是歪曲地应用唯物史观,只要真正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研究历史,我们史学就会出现新的局面,就不会出现教条主义、公式化、简单化的缺点与错误。回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命运,总结这方面的根本经验,对于开创新世纪史学的新局面,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应该说,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解决实践性与科学性辩证关系上,虽然并不是解决得很好,但要看到这是要一个过程的。在当时,中国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历史、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还处在学步阶段,在一定意义上说,有些缺点是难以避免的。今天我们在反思百年史学发展道路时,不能抱着蔑视眼光来讥讽。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家,对于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有了自觉的意识。马克思主义史学者之间,也有争论;有的在后来深入研究中也证明是有缺点的。但我们更应该指出,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并不是一回事;各种研究结论也会不断发展、更新。重要的是,历史学工作者明确了历史研究要以唯物

史观为指导,明确了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的实际结合起来。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过去是我们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将来同样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可分割的部分。实践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鲜明的特色,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史学工作者要通过自己的扎实研究,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而贡献力量。

应该说明,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践性的理论基础,是《实践论》和《矛盾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继承中国民族史学的经世史学优良传统,但两者并不完全是一回事。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践性的“用”与经世史学的“用”有相同的地方,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性有他更为重要的理论基础。这与一般谈史学方面的“应用”也不是一回事。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性的“用”与实用主义的“用”更不是一回事。

影射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潮,是“四人帮”的阴谋工具,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批判影射史学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践性所必须的。

——关于历史教育的问题。

历史教育,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是整风运动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了群众和干部,培养了一大批史学研究骨干,收到相当大成效。这本书有专门篇章论述。书中引用廖盖隆的回忆,说:“吕振羽同志是我的老师,我在延安时就听过他的中国古代史的讲演,我喜欢听吕振羽同志的讲演,喜欢读他的史学论著,衷心钦佩这位史学界的老前辈,还是因为他的讲演和论著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探索解决中国史学领域中的问题,理论性强。”(见本书第213页)

外国学人也看到这一点。书中引用的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的话,说:“整风运动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懂得自己的

历史和传统，教导他们以独立和创造性的方式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见本书第 34 页。）

所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历史教育是重要的；为动员千百万群众为民族的光明前途奋斗，历史教育同样是重要的。读到这些内容，我们有很多感触。

抗战时期的延安地区和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共同创造出的史学，又为建国后中国史学打下了基础；其中的不足以及相关争论，也直接影响到建国以后的历史学。所以，认真研究抗战时期的延安地区的史学，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洪认清博士今后会有更多更好的成果出现，我深信这一点。今后会有更多的学人，会关注相关的问题的研究，我也是深信的。因为这样的总结，对于新世纪史学发展，将产生直接影响。

2006 年 7 月

目 录

序	[1]
绪论	[1]
第一章 延安学风和延安史学的特点	[11]
第一节 延安和重庆:抗战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研究中心	[11]
第二节 边区文化运动与延安史学	[17]
第三节 延安史学的历史地位	[32]
第二章 毛泽东与延安史学	[57]
第一节 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史学思想和历史理论 ...	[58]
第二节 毛泽东与中共党史学学科体系的初步建立 ...	[78]
第三节 毛泽东对延安史学的指导	[90]
第三章 延安根据地的史学理论和传统文化研究 ...	[104]
第一节 延安根据地史学理论研究的兴起	[104]
第二节 延安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114]

第四章 延安学者在中国古代史领域的探索	[125]
第一节 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学术争鸣	[125]
第二节 原始社会史研究的新探索	[138]
第三节 新型中国古代通史的面世	[146]
第五章 延安学人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161]
第一节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性质问题的探讨	[162]
第二节 近代思想史领域的新突破	[173]
第三节 近代中国通史的编纂	[187]
第四节 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繁荣	[189]
第六章 延安的干部历史教育	[194]
第一节 延安根据地干部历史教育的全面开展	[194]
第二节 干部历史教育的方式和历史学习的主要材料	[201]
第三节 干部历史教育的成效	[211]
附：抗战时期的史家和史学	[218]
结语	[236]
后记	[239]
参考文献	[241]

绪 论

一、本文研究的基本范围和意义

本书研究抗战时期延安根据地史学的发展状况。本书所说的延安史学,包括延安史家的史学研究及相关学术活动、党的领导人的史学思想、延安的中共党史研究和干部历史教育,延安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学习、研究历史和对历史的认识等内容。值得指出,从学科门类来说,中共党史今天已归属法学门类下的政治学学科之中,但关于中共党史的学科性质,学界一直没有定论,毛泽东在1942年对中共党史的历史学学科属性作了明确界定,故本书将延安的中共党史研究作为延安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延安史学的发展主要在抗战时期,因此本书特以抗战时期为时限进行考察。

抗战时期的延安史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现代史学的整体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研究抗战时期的延安地区史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重大的现实借鉴意义。

研究延安史学,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史学近代化问题的认识。唯物史观的学习和运用,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个伟大进步;延安史家自觉地普遍运用唯物史观作为观察社会历史的工具,对中

国历史和近代社会性质作出全新的解释,把历史作为客观的有规律的对象加以研究,表现出与数千年的旧史学截然不同的特点,在理论层次上也要高于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新史学;延安史学代表了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的主流方向。系统地研究延安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认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历程,对于讨论百年史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所有的爱国史家都在思考史学如何为挽救民族危亡服务的问题,他们在各自不同的领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抗战服务。抗战时期的史学,从区域上说,可划分为沦陷区史学、国统区史学和以延安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国统区史学又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其他新史学等。在抗战中,逐渐形成了延安和重庆两个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心。两地马克思主义史家遥相呼应、相互配合,共同为史学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空间的分离、所处环境的差异以及各自治学道路的不同等因素,两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点也有所不同。延安地区史学有自己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特点。延安的史学家们始终强调史学研究服务于革命斗争、服务于抗战的功用,他们与救亡和革命的时代主题相呼应,把史学纳入革命和救亡的轨道,建立了评估和重视中国历史的新标准,其史学研究体现出贴近现实的强烈战斗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延安史学属于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延安史学,对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有重大的意义。深入研究抗战时期的延安史学,给延安史学以准确的历史定位,可以更好地把握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总体特点。

研究延安史学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中国当代史学发展的走向。从抗战爆发后,延安成为中华儿女向往的地方,进步文化工作者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在党的安排下,何干之、尹达、范文澜、吕振羽等一批史学工作者先后来到延安,他们是延安地区史学研究的中

坚力量,建国后仍对历史科学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他们在延安时期撰写的史著对新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直接影响到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学体系的变化。总结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对于建设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研究延安史学有助于更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抗战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就是毛泽东一系列历史认识的提出。毛泽东把学习和研究历史视为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多次指出研究历史的重要意义,在延安期间尤其强调这一问题。如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就严肃指出,不重视研究历史是极坏的作风之一,强调要有组织地进行历史研究。毛泽东以其崇高之领导地位,倡导大兴学习历史之风,这对于延安史学乃至新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关于史学的论述是延安史学的重要内容,延安史学的发展与毛泽东的直接指导是分不开的。抗战阶段是毛泽东思想不断走向成熟的时期。毛泽东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进一步研究抗战时期的延安史学,有助于深化对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研究。

研究延安史学对研究中共党史学史有促进作用。延安时期是中共党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真正对党的历史发展规律有比较明确认识的党史研究是从延安时期开始的。在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大力倡导下,全党掀起了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的热潮,高级干部带头研究党史,极大促进了党史研究科学水平的提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总结出毛泽东思想,这在中共党史学史上是一件大事。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角度系统总结延安时期中共党史学的发展历程,对于促进中共党史学学科的发展是有意义的。

研究延安史学有助于探讨一些重大政治理论问题。以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问题为例。延安史家赞同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史学研究,但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而主张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他们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特殊性问题所进行的研究,实际上就是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延安史学的核心和灵魂。关注延安史家为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在史学领域所开展的工作,对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大课题是有益的。

延安史学是延安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当时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仍十分注重文化建设,制定了尊重知识分子、奖励自由研究、欢迎科学知识和文学艺术人才等一系列政策。在党的组织下,进步文化工作者云集延安,掀起了边区文化运动。延安的史学研究就是在边区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延安史学工作者为创造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通过研究延安史学的发展,进而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成功领导文化建设的若干经验,显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二、关于延安史学的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对延安史学的研究,已引起学界的重视,并有一批研究成果面世。

有部分专著涉及对延安史学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1)马金科等编著的《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该书中的“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贡献”、“延安根据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的兴起,张闻天、叶蠼生的党史研究成就”等章节,对毛泽东的史学贡献,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史学研究概况,延安史家范文澜、何干之、尹达等人的史学成就,延安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状况等问题进行了概括性叙述。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

把延安史学置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进程中十分重要的位置,其专论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繁荣的一章,用了四分之三的篇幅叙说延安地区的史学研究成就。(2)桂遵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该书按时间顺序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和发展进行了系统论述,第三编有多处论及延安地区的史学研究成就。(3)德国学者罗梅君著《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以西方学者的独特视角,系统深入地探讨自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进程,尤其侧重对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作者精心选择了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胡绳、何干之等六位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作为研究对象,其中范文澜、何干之抗战初即到达延安,属延安史学家;吕振羽于1942年到达延安,也可算延安史学家。(4)张静如等著《中共党史学史》。作者认为,“真正对党的发展规律有更明确认识的党史研究,是从延安时期开始的”。该书第二章对延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对中共党史学的贡献,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叶蠡生的《中国苏维埃运动史稿》等论著的学术价值进行了论述。(5)田亮的《抗战时期史学研究》一书第二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一——延安篇”,论述了毛泽东、范文澜、尹达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想、延安的通俗史学及历史教育状况。

以上所列举的五部著作,除综述延安时期的史学研究成就外,还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学术探讨。例如:对延安与重庆两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不同特色作比较。桂遵义认为,“延安史学工作者,接受党中央的任务,编写中国通史,并开展中国近代史、思想史研究,用以提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历史规律的认识,用以指导现实革命斗争。重庆的史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积极宣传抗日统一战线,批判法西斯史学理论和封建复古思潮,同时,深入开展